

19 拱衛京畿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國民一軍高級將領在北京舉行軍事會議。會上國民一軍代總司令張之江主張立即撤出北京，退往察、綏，將北京交段祺瑞，使段、吳（佩孚）、張（作霖）在京相互掣肘，轉移對國民軍的壓力。李鳴鐘、鹿鍾麟則反對立即撤出北京，理由是西北荒漠之地，十幾萬健兒就食其間，無異坐以待斃，力主固守京畿，倘無和平辦法及正式交代，絕不放棄京畿；欲使國民軍讓步，必須通過和平途徑，武力壓服絕不接受。此即國民軍中鷹派觀點，鹿鍾麟為鷹派之核心人物，韓復榘則為鹿最有力的支持者。

馮玉祥赴俄後，張之江擔任國民一軍代總司令，只是名義上的領袖，實際上是張、李（鳴鐘）、鹿（鍾麟）的集體領導，三人資歷盡在伯仲之間。張之江在天津戰役之後，因指揮不力而

遭馮玉祥的冷落，手中又沒有自己的嫡系武力，其意見不再具有權威性，位尊而言輕。李鳴鐘在天津戰役中扭轉乾坤，威望大增；鹿鍾麟早在「北京政變」後即成為舉世矚目的風雲人物，兩位「都是活躍的人」（劉汝明語），況且又有韓復榘、石友三等實力派將領的鼎力支持，最終還是鷹派的意見占據上風。如果說，過去國民軍領導層貌合神離，那麼現在，即使是國民一軍內部也已發生分裂。

為拱衛京畿，國民軍分三路禦敵：

一，韓復榘負責京津路，防堵直魯聯軍，共設置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在楊村，由劉汝明第十師負責；第二道防線在廊坊，由第五混成旅劉玉山部負責，第三道防線在黃村，由韓復榘第一師負責。

二，石友三負責京漢路，防堵吳（佩孚）軍及晉軍，共設置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在保定，由方振武國民五軍負責；第二道防線在高碑店，由魏益三國民四軍負責；第三道防線在琉璃河，由石友三第六師負責。

三，唐之道第九師、孫連仲騎兵第二師、門致中警備第二旅負責京榆大道，防堵奉軍。



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曹錕

國民軍總司令部任命韓復榘為京東南方面總指揮；石友三為京南方面總指揮；唐之道為京東方面總指揮；鄭金聲為京東北方面總指揮（所部第三師駐順義）。

由於京漢路與京榆大道上的吳（佩孚）軍、晉軍及奉軍都知道國民軍是塊硬骨頭，誰也不願先出頭，均進展緩慢，意存觀望，只有京津路上的直魯聯軍因切身利益所驅，衝鋒在前，迫薄都門，因此韓復榘便承擔了拱衛京畿之重任，當然這也是鹿鍾麟的刻意安排。

不久，國民二、三、四、五軍均撤至北京西郊，拱衛京畿的任務主要由國民一軍擔任。是時國民一

軍有步兵十一師，騎兵二師，除甘、綏、察、熱留四個步兵師外，其餘部隊全部用於京畿防務。

三月二十五日，李景林生辰，在天津日租界新明大飯店舉行祝壽活動，宴請同僚，同時即席發表褚玉璞任直魯聯軍前敵總司令；榮臻任前敵總指揮；胡毓坤任右路司令，與三河縣方面之奉軍相聯絡；徐源泉任左路司令，與京漢路吳軍相聯絡。



漫畫中的國民軍士兵（左、中）與魯軍（張宗昌）士兵，背後為當時的軍用鐵甲車。

同日，直魯聯軍李爽愷師、榮臻師、朱益清師、王賓師、李望旅、李濱淪旅、衛隊旅、騎兵旅及白俄軍團等共計四萬餘人向津北開動。

二十六日，國民一軍劉汝明旅撤出京津路第一防線楊村，轉移到北京西北的南口，構築防禦工事。直魯聯軍涅恰耶夫將軍乘機率領敢死隊及步兵一旅組成快速突擊部隊，以鋼甲列車為先導，乘汽車穿越楊村、落垓、廊坊、萬莊等國民軍第一、二道防線，直插黃村車站。是時韓復榘師主力大部集結在黃土坡至南苑一線，致使涅恰耶夫乘虛而入。韓與坐鎮豐台的石友三緊急會商，派石師一部自良鄉出發，向深入到黃村至魏善莊之間的敵軍發動攻擊，切斷其退路。韓師一部則由黃土坡向黃村反攻，對入侵之敵取南北夾擊之效。經過一番激戰，直魯聯軍奪路而逃，國民軍繳獲鋼甲車一列、汽車四十輛，收穫頗豐，然而涅恰耶夫將軍的驍勇也給韓留下深刻印象。

鋼甲車，亦名鐵甲車、鋼甲列車，二次直奉戰時，張宗昌接受沙俄將軍葛斯特勞夫建議，利用鐵路機車及各種鐵路車輛，改裝、組編成軍用鋼甲列車，協同步兵作戰。葛氏根據其在俄國內戰時的經驗，設計了這種裝有七分厚鋼板的軍用列車，外面塗以保護色，其結構是以火車機車置於列車中間，前後兩端各掛兩節客車，以為官長座車及士兵乘車；在此基礎上，前後兩端延伸，再各掛兩節「悶罐車」，「悶罐車」車廂兩側各有上下兩排機槍射孔，內設梅可馨式重機槍；前後「悶罐車」再向外延伸，各掛一節敞篷車，車廂分上下兩層，下層安裝野戰炮六門，上層架設迫擊炮兩門；敞篷車再向外延伸，各掛一節平板車，上置鋼軌、枕木及一應機具材料，準備修復

鐵路、橋樑之用；各節車廂之間有步話機相聯絡。此種鋼甲列車在我國一直沿用到抗日戰爭。

國民軍的蘇聯軍事顧問幫助國民軍改裝鋼甲列車，國民軍也有了鋼甲車團。顯然，俄國人，無論白軍還是紅軍，都對鋼甲車情有獨鍾。

韓復榘對鋼甲車並無太大的興趣，雖然以後在他的軍隊裡也有鋼甲車部隊，但只偶爾用於實戰，更多的是當做他巡遊的運輸工具。

黃村方面戰事暫時停頓三天。其間，魏益三突然宣布脫離國民軍，所部國民四軍易名「正義軍」，棄守高碑店防線。魏之倒戈，迫使國民軍在京漢路上的防線後退到距北京很近的長辛店。國民軍在京津路上的防線也撤退到黃村。於是，韓復榘與石友三的防區聯在一起，共同防禦北京東南方面，韓總負其責，司令部設在南苑，石副之，司令部設在豐台。一度隨韓參加津浦路反擊戰之第五混成旅劉玉山部、騎五旅李忻部、騎六旅蔣文煥部仍調歸韓指揮，國民軍鋼甲車團之五列鋼甲列車亦聽韓調遣。

此刻，京東通州方面尚無戰事。京漢路上吳佩孚之「討賊聯軍」第一路總司令田維勤部進至保定（方振武之國民五軍已退至盧溝橋）便停滯不前。蓋田秉承靳雲鶚意旨，主張「聯馮討奉」，不肯積極北進。唯京津路上的直魯聯軍仍十分活躍，四月一日，李景林親率俄兵一部及鋼甲車一列，赴楊村督戰；直魯聯軍前敵總指揮榮臻赴廊坊督戰。

四月一日，國民軍部分高級將領在北京舉行軍事會議，一軍鹿鍾麟、韓復榘、鄭金聲、門致

中、陳希聖，二軍弓富魁，三軍胡德輔，五軍方振武出席會議，一致議決凡北京方面的軍事及政治行動全部聽從鹿鍾麟指揮。駐北京的國民一、二、三、五軍組建聯合辦公處（四軍魏益三部已脫離國民軍系統），設在東城帥府園，由鹿主持。韓復榘、石友三守護京東南；陳毓耀、弓富魁（二軍）、徐永昌（三軍）、方振武（五軍）守護京西南；鄭金聲、孫連仲守護京東北；唐之道守護京東，駐軍通州；門致中、許驥雲、馬鴻逵駐軍北京城內；宋哲元駐軍熱河。

同一天，也是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閻錫山聯合下達「討赤之戰」動員令，命直魯聯軍沿京津路進攻黃村；吳軍沿京漢路進攻長辛店，門頭溝；奉軍同時進攻承德、通州；晉軍進攻晉京綏路之大同、天鎮。

以上各路「討赤」大軍，吳軍因田維勤意欲與國民軍謀和，咸懷觀望；閻錫山首尾兩端，態度曖昧；奉軍一部開始向通州出擊；唯進攻黃村之直魯聯軍行動迅捷。

自一日起，已越過安定的直魯聯軍在榮臻指揮下分三路發起進攻，中路攻打黃村，右翼攻打馬駒橋，左翼攻打龐各莊。韓復榘指揮所部奮起反擊，一週之間，雙方反復「拉鋸」，陣地幾易其手，戰鬥異常激烈。

三日，在隆隆炮聲中，北洋政府授予韓復榘陸軍中將銜。

同時授予陸軍中將銜的國民一軍嫡系將領還有孫連仲、劉汝明、石敬亭、石友三、門致中、張允榮、陳毓耀、劉玉山、宋式顏、李忻、王鎮淮、趙守鈺、楊兆林、張壽桐、王奎元等。佟麟

閣授少將加中將銜。

從三日起，奉軍飛機連續三天在北京城內上空投彈（飛行員手擲小炸彈），毀屋傷人，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北洋元老王世珍發起「和平運動」。

張宗昌見榮臻連日進攻進展不大，指斥李景林直軍作戰不力，將魯軍主力褚玉璞第一軍及孫殿英第三軍第二十五師加入前線，激戰兩日，仍未突破韓軍黃村防線。

七日，直魯聯軍前敵總指揮榮臻將進攻重點從黃村向東轉移至南紅門、馬駒橋，目的在於避實就虛，並爭取東線奉軍支援；直魯聯軍前敵總司令褚玉璞親赴前線指揮。

韓麟春指揮奉軍炮兵一部協攻三間房、馬駒橋。

是晚十一時至次晨八時，直魯聯軍與奉軍在黃村、南紅門、馬駒橋、三間房一線，先後發動五次衝鋒，均被國民軍擊退。直魯聯軍鋼甲車「長城號」及「長江號」在黃村被韓軍炮火擊毀，斃俄兵百餘人。

九日，直魯聯軍與奉軍終於在南紅門、馬駒橋、三間房得手，唯京津路正面黃村尚未拿下。

自九日至十一日，直魯聯軍與奉軍同韓、石指揮的國民軍在黃村展開激烈的炮戰。奉軍在全國各軍中，擁有陣容最強大的炮隊，火力異常猛烈。韓復榘以過時的重迫擊炮還擊。此類型的重迫擊炮過去從未使用過，發射時響聲極大，整個北京城都能聽到，但殺傷力並不大。

來自黃村的隆隆炮聲，給北京市民帶來極大的恐慌，白天還可以，一到晚上根本無法入睡。

經過三晝夜的炮戰，韓復榘終於不支，放棄黃村，撤守南苑，距北京城的安定門僅十六華里。石友三軍撤守豐台。從南苑至豐台已是國民軍在京南最後一道防線。

正當韓復榘京南鏖戰之際，鹿鍾麟又在北京發動一起不流血的政變。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凌晨二時，鹿鍾麟下令國民軍大刀隊關閉城門，切斷通訊，命門致中派兵包圍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及吉兆胡同段宅。段祺瑞事先予聞，倉促躲到吉兆胡同一位老同學崔某家中，時間僅差二十分鐘，過了一夜，次晨避入東交民巷一座由法國人辦的公寓裡（桂樂第大樓）。

是日，鹿鍾麟發表通電，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狀：「金佛朗案」；屠殺學生；挑撥戰爭。同日，鹿致電吳佩孚，表示竭誠擁戴之意：「吳玉帥以命世之才，報救國之志，數奇不偶，養晦黃州，志士仁人無不扼腕。乃段密派軍艦，前往加害，嫉賢妒能，幾摧柱石。」「麟等此後進止，唯玉帥馬首是瞻，政治非所敢問。」鹿又發表司令部布告，表示要「保護總統曹公，恢復自由，並電請吳玉帥即日移節入都，主持一切。」

鹿鍾麟對此次非常行動的私下解釋是：段祺瑞暗中勾結奉張，準備迎奉軍入城，抵制吳佩孚；以京師警衛總司令為餌，引誘國民一軍第九師師長唐之道，供其驅使；將執政府衛隊隊長戴光升由天津召至北京，準備以非常手段逮捕鹿，並與奉軍裡應外合，趕走國民軍。鹿偵知以上情況，遂決定先發制人。

外間輿論普遍認為，鹿鍾麟的解釋基本符合事實，但其主要目的還在於使國民軍擺脫目前困境，發動政變，不過是其實施「驅段、放曹、迎吳、拒奉」策略的一個重要步驟。

此前，鹿鍾麟為解除國民軍困境，曾響應王世珍倡言之「和平運動」，向奉張伸出橄欖枝。但奉張提出國民軍必須放棄京畿、直隸及熱河為先決條件。國民軍當然無法接受。而當鹿轉而與吳佩孚軍第一路總司令田維勤接洽，卻十分順利。吳軍總司令靳雲鶚與田維勤都是吳軍中親馮反奉的代表人物，這也是吳軍何以在京漢路上一路龜步前移的原因。鹿向田的代表鄭重承諾：歡迎吳軍入京，駐防南苑，與國民軍共同抵禦奉軍。鹿的「驅段、放曹、迎吳、拒奉」策略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

引人注目的是，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等均不贊成鹿鍾麟的「驅段」之舉，拒絕在鹿十日發表的攻段電報上具名。在鹿電列名的只有鹿鍾麟、徐永昌、方振武、鄭金聲、韓復榘、石友三、孫連仲、門致中、佟麟閣、唐之道、龐炳勳、梁壽愷、顧占黿、張廷諤、耿乃西（吳佩孚私人代表）等十六人。鹿電請張之江來京商議善後之策，張亦不予答覆。國民一軍內部的裂痕逐漸擴大。

但在「放曹、迎吳、拒奉」等問題上，張之江等與鹿鍾麟的意見完全一致。早在國民軍撤離天津時，張即致電吳佩孚，表示吳軍如能盡快北上，國民軍願意讓出北京地盤。但在吳軍到來之前，絕不令奉軍入京。

十日上午十時，韓復榘從南苑前線趕回城內，代表鹿鍾麟至中南海延慶樓福祿居晉謁曹錕，

報告驅段始末。曹謂：「前此聯軍飛機來京，使民飽受虛驚。此次總以保全生命，使小民不受驚恐為是。」韓又告以國直（吳）合作情形，請曹從中斡旋。曹雲：「我亦國民，只求力所能做者，准努力做之，以減兵禍。」言下對政治態度甚為冷淡。韓問曹獲自由後，欲往何處居住，彼軍願隨同保護。曹答：「此處頗安適，不願他往。」（註一）

昔日階下囚，今朝座上賓，一場《捉放曹》的戲至此告一段落。

當鹿鍾麟攻段迎吳的通電傳到漢口，吳佩孚的幕僚們欣喜若狂，以為大功告成，出頭之日到了。不料，吳在電報上大筆一揮，批了四個字：「全體繳械」。眾幕僚倒吸一口涼氣，面面相覷：國民軍的實力即使是現在，也遠在吳軍之上。如此條件國民軍能接受嗎？經幕僚再三苦諫，吳稍微讓步，改成：酌留張之江一師聽候改編，其餘仍須繳械。後來，吳總算答應將馮部縮編為一個旅，因為馮本來就只有一個旅！而且，馮玉祥與鹿鍾麟都必須下臺。

性格倔強的吳佩孚對馮玉祥、鹿鍾麟均恨之入骨，必置其死地而後快。吳覆電鹿：「妖人以和平美名，為挑撥之詞，與和平真意相違。此假和平電，應予扣留。」

吳佩孚對張之江就客氣多了。吳覆張電，稱：「馮雖遠走，不能取信。鄙人對於兄個人之忠實勤樸，治軍嚴正，多所讚許，忠事馮氏，義分所在，實為欽佩。茲酌定請兄將所部交閻百帥（閻

（註一）《申報》，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錫山），暫行接收，俟僕派員整理後，再酌定另行接洽辦法。」（註二）

吳佩孚十一日致電張宗昌、李景林，略謂：與國民軍議和，若相手方為張之江，可以信賴；若鹿鍾麟，則為反覆無常之人物，非將其軍隊三萬人繳械不可，不必與之議和云云。（註三）

同日，曹錕顯然是在人授意下，致電吳佩孚，為鹿鍾麟說項：「鹿君見識過人，深明大義，願隸麾下，以當前驅；已於本日，不動聲色，不鳴一槍，復我自由，揚彼之惡；即遣該軍師長韓復榘赴漢報告。兄亦派劉中將文亮同往，乞予優待，以示獎恤。時至今日，論公論私，均無再戰理由。」吳在湖北查家墩司令部收到曹錕蒸電，於電末批「假電」二字，再未覆電。

韓復榘是西北軍中公認最優秀的戰地指揮官之一，從來都不是軍人政客。鹿鍾麟擬派一向不善辭令的韓去吳軍做說客，這種安排看似異乎尋常，其實也不無道理。西北軍人都知道，韓在北方軍人中最崇敬吳佩孚，視之為軍人楷模。即使是在馮、吳結仇之後，韓在袍澤間也從不諱言自己的觀點。正基於此，鹿才將完成「破冰之旅」的希望寄託在韓身上。

同日，韓復榘在南苑司令部接受《申報》記者採訪，謂：「吳（佩孚）對國民軍之諒解已成。立。田（維勤）部現駐防琉璃河，兩三日內來駐南苑亦未可知。國民軍唯一目的在和平，斷然由天津、馬廠撤兵亦不外達此目的。與張作霖合作之說有誤。原期奉軍不入關，今則奉軍不但入關，

（註二）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卷，一千五百〇二頁。

（註三） 《申報》，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且由榆關至天津，更向北京攻擊，以武力遂其野心，且行動益行明顯。基於此舉，似已破壞對奉之諒解。目下，國民一軍之目的，吳氏亦已瞭解。國民一軍對時間並無成見，今則唯聽吳（佩孚）之命令。現與奉軍敵對，但奉軍如願和議，亦不惜與之言和。若奉軍繼續其作戰行為，則國民軍為自衛計，寧首當其衝也。」（註四）

十二日，吳軍進至長辛店。次日，田維勤微服來到北京帥府園鹿鍾麟司令部，密告鹿及韓復榘：「吳玉帥不日即將北上，我不能在此久留，你們的隊伍要從速撤出北京，否則就走不成了。」鹿及韓緊緊握住田的手，動情地說：「田總司令是來救命的！」

鹿鍾麟急電奉軍，先行停戰，俾國民軍自行撤出北京。奉軍不置可否，卻於次日由李景林、張學良、褚玉璞聯名通電嘲鹿：「前日擁段，今日驅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間，一人賢否，前後大異；一日之間，兩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惡無常，恩仇不定。」鹿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註五）

十三日，韓復榘因戰事日急，難以分身，張之江致電吳佩孚，改派門致中赴鄂晉謁，願竭誠擁護，聽候改編調遣。吳命秘書電覆：「除執事與瑞伯（鹿鍾麟）下野，交出部隊外，別無善策。蓋執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決心，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於諸帥。一俟群疑盡釋，自當借重長

（註四）《申報》，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註五）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下卷，一千五百〇四頁。

才。」（註六）

極端情緒化的吳佩孚再度關閉了與國民軍和解的大門。

鹿鍾麟驅段放曹之後，奉軍與直魯聯軍將領立即在天津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從速占領北京，以防吳軍捷足先登。十二日，張學良、張宗昌、褚玉璞率督戰隊、大刀隊及兩個混成團親赴前線，限令各部三十六小時攻克南苑、通州，四十八小時占領北京。

自是日起，京南及京東方面戰鬥明顯升級。十三日，京東方面發生變故，國民一軍第九師師長唐之道放棄通州防地，回師京城，兵薄朝陽門下。十四日，奉軍占領通州；吳軍進據西苑，北京東、西大門洞開。唯京南之南苑與豐台仍在韓復榘師與石友三師控制之下。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張之江下令國民軍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察哈爾。段祺瑞離開東交民巷，宣布復職，罷黜鹿鍾麟。唐之道率部首先開進北京，就任段祺瑞所封之京師警衛總司令。不料三天後，遠在漢口的吳佩孚電令王懷慶為京師畿警衛總司令，唐副之，並令其監視段。

唐之道（一八七七—一九三二），字潤甫，直隸南樂人，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第二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七期畢業，段祺瑞舊部。皖系失敗後，唐加入直系，任閻相文第二十師參謀長兼團長。閻在陝西自殺，唐投靠馮玉祥，任陝西督軍公署軍法課長。馮發動「北京政變」後，唐收編直系王維城第二十三師，就任國民一軍第九師師長。

（註六） 陶菊隱：《吳佩孚傳》，一百三十四頁。

國民軍撤退是有條不紊進行的，紀律嚴整，行動迅捷。國民一、五軍（方振武）各部沿京綏線退往沙河、南口、延慶一帶；宋哲元部由熱河退往多倫；國民二、三軍在弓富魁、徐永昌、胡德輔、武勉之率領下自京西經三家店、南口，退往涿鹿、懷來。

鹿鍾麟於十五日晚偕過之翰等，率四十名大刀隊出六國飯店，至西直門火車站，乘六十四號專列離京赴南口。

十六日凌晨，韓復榘師在大雨滂沱中悄悄撤出南苑軍營，經西便門、阜成門，直達西直門火車站，乘火車駛往南口。京南方面隨韓師同時撤走的還有豐台的石友三師與劉玉山旅。

就在韓復榘師撤出離南苑軍營數小時後，萬福林即率奉軍進抵南苑，隨之派二千騎兵沿韓師撤退路線搜索跟進，朝海澱方向追擊。

十六日下午，鹿鍾麟、鄭金聲、韓復榘、石友三在南口龍虎台點驗國民一軍各部兵員、槍械。至十八日，國民一軍主力大部集中在沙河、南口一帶。石友三師、劉玉山旅在沙河、南口之間；韓復榘師、衛隊旅在居庸關、八達嶺一帶；劉汝明師在岔道城；佟麟閣師在延慶；方振武軍、孫連仲師在昌平以西。

扼守南口，既是國民軍當務之急，也是國民軍預謀的決策，在南口、居庸關、青龍橋一線構築防禦工事，在蘇聯軍事顧問的直接參與下，早已進行多時。

奉軍與直魯聯軍十八日開進北京城。

段祺瑞復職後立即為吳佩孚所詬病，旋又遭奉張冷遇，進退失據，乃於十九日通電下野，乘火車離京返津，途經廊坊車站，想起死於非命的徐樹錚，不禁潸然淚下。段從此淡出政治舞臺。

曹錕恢復自由後，張作霖曾一度有意保其親家復位，但吳佩孚堅持「護憲」，力主恢復顏惠慶內閣，對曹復位並不熱心。曹乃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通電下野，不久便回到保定，息影故居光園。

